

企业腐败及其动因、效应与治理： 国际视野与中国路径

□ 张三保 张志学 陈小鹏^①

摘 要：全球范围内的腐败，绝大多数发生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然而，迄今有关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本文则聚焦于企业主体，根据现有文献，探索其腐败成因、效应与控制。分析发现：①企业腐败的动因，包括个体、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的多种要素及其互动；②企业腐败的微观效应，包括掠夺之手、扶持之手、无为之手，乃至不同情境下的权变之手；③企业腐败的控制，需兼及组织内部与外部，结合微观与宏观，实施多维治理。最后，结合中国情境特征，本文从六个方面指出了未来研究与改革方向，并构建出一个腐败分析框架。

关键词：企业腐败；反腐败；制度变革；战略领导

一、引言

腐败本身的长久性和普遍性，以及大规模腐败案件的频发，促使腐败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反腐成绩有目共睹，但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李雪勤，2014）。究其根源，“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中央纪委研究室，2014）。

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尚存四点有待改进之处：①研究对象。一方面，既有腐败研究大多聚焦政府而忽略企业。事实上，绝大多数腐败均发生于商业组织与政治机构之间（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1），因而企业等营利性组织应该对腐败的形成承担

^① 张三保、陈小鹏，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志学（通信作者，E-mail: zxzhang@gsm.pku.edu.cn），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观企业腐败的宏观制度诱因、作用机制与控制策略（71402129）”和“变革视野下中国企业领导的演变（713720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宏观制度环境、CEO 管理自主权与微观企业战略（13YJC630226）”的资助。作者感谢两位外审专家、领域编辑和季刊主编的宝贵意见和专业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更大责任（Luo，2005）。甚至有企业家断言：“中国官员的散漫和腐败很多时候是企业家慢慢培养出来的（曹德旺，2014）”。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从企业角度理解腐败问题，或许更加恰当和重要（李捷瑜和黄宇丰，2010）。另一方面，尽管也有少量研究关注企业内部（Fein & Weibler，2014），如考察高管腐败问题（徐细雄，2012），但与企业腐败存在显著差异：尽管企业腐败多由高管实施，但高管腐败通常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内部治理问题，是高管从企业攫取资源为己所用的行为；而企业腐败的分析层次更高，与政府腐败相对应，研究结论也对“从体制、机制、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更有价值。②研究视角。腐败成因涉及心理、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因素（Getz，2006），任何单一学科视角都难免有失偏颇，因而有必要从跨学科视角进行整合研究。③研究层次。既有研究多分别从个体、群体、组织、行业乃

至制度层次探讨成因，忽视了多层次成因之间的互动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动因（Ashforth et al.，2008）。④研究结论。目前关于腐败效应的研究结论，至少涵盖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难以形成共识，由此给反腐政策的制定与落实造成了障碍。

中国要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实现“从体制、机制、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愿景（李雪勤，2014），就有必要在反腐实践中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突破前述局限。聚焦企业腐败、探索中国反腐实践的微观路径，是当下反腐研究的新方向。全文各部分安排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首先，阐释企业腐败的界定、分类与测量；其次，分析企业腐败的多层动因与多重效应；再次，探索腐败控制机制；又次，探究中国情境下企业腐败的特殊性；最后，评述既有研究不足，指出潜在研究方向，并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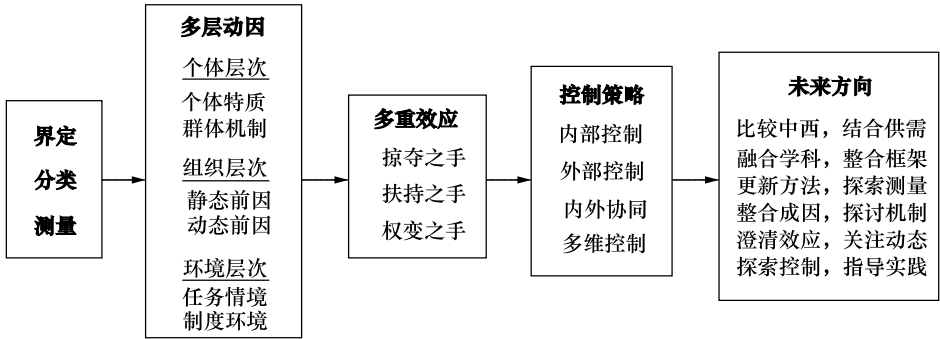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腐败的研究脉络

二、企业腐败的界定、分类与测量

（一）企业腐败的界定

腐败的界定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差异。经

济学将腐败视为一种权力寻租行为，即个体为了私有或个人利益而滥用职权的行为（Tanzi，1998；Getz & Volkema，2001）。在管理学领域，腐败是一种不道德、反社会、不良的偏差行为，组织的不正当或反生产行为（Ashforth et al.，

2008)。政治学则关注腐败行为的主体,认为它是公职人员为了私利以权谋私的行为(何增科,2008;白景坤,2009)。更一般地,《牛津词典》将其界定为“掌权之人的不诚实或非法行为”。

综上视角,本文将企业腐败界定为企业这一营利性组织与政府之间的非法资源交换。就此界定,有三点需要进一步说明:①尽管营利性组织腐败问题的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非营利组织,但前者在反腐败进程中具有更大的责任。②这里界定的企业腐败问题,尽管其逻辑也可能适用于企业之间,但企业与政府间的腐败,则是绝大多数经济体中腐败行为猖獗的元凶。③关注企业腐败,并不意味着个人腐败不重要——事实上,企业层次的腐败是由高管或不同层次的雇员来完成,且他们的行为也部分或者完全代表着组织——然而,个体腐败与企业腐败又有着本质区别,以腐败的最初动机及受益对象来区分:个体腐败(如高管腐败)的最初动机是获取一己私利,甚至不惜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企业腐败则无论谁是实施个体,其最初动机是使企业受益(Luo, 2005)。

(二) 企业腐败的分类

基于上述对企业腐败的界定,有研究从受益人与合谋两个维度,将组织层次的腐败区分为“腐败个体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corrupt individuals)和“腐败的组织”(corrupt organizations)两种类型(Pinto et al., 2008)。这两个维度分别包含两个具体问题:①腐败行为的初始受益方是个体,还是个体所代表的组织?②腐败行为的实施方是个体,还是两个及以上的行为主体?尽管这两种腐败在测量和分析层次上均以组织为观测单位,但前者是组织成员

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腐败行动;后者则指为了组织的利益,组织中的群体以协同腐败。对于后者而言,即使个体能够从代表组织的腐败行为中获益(如分红或者高价的优先股),但组织仍是最初与直接的受益方(Wheeler & Rothman, 1982)。

此外,还可根据腐败强度的大小与卷入层级的高低两个维度,将企业腐败分为四种类型。这些腐败行为在实践上一般表现为行贿、诈骗、勒索与徇私四种形式,其本质则可从七个方面来描述:以情景为基础,偏离道德,与权力相关联,非常隐蔽,蓄意为之,事后机会主义以及可以感知(Luo, 2005)。

(三) 企业腐败的测量方法

1. 直接度量:访谈和问卷

理论上,要使经理人愿意坦白谈论腐败,必须运用合适的调查方法和访谈技巧:①选择当地的行业协会作为调查的实施者,以避免政府介入带来的不信任;②以间接方式逐步引入腐败问题,以避免回答者卷入不当行为中;③在访谈的最后提及腐败问题,以使调查者有足够的时间建立起必要的可信度和信任;④在问卷不同板块中以多样的方式提及腐败问题,以提高腐败数据的真实性(Reinikka & Svensson, 2006)。实践上,直接询问的内容主要包括腐败额度或比重、腐败频率、是否腐败以及综合方法四个方面。

第一,腐败额度或比重。比如,可以通过询问企业“向海关、工商、税务、治安或环境管制部门所支付的额外或不合理费用”,实施企业腐败调查(Reinikka & Svensson, 2001)。也可询问企业:“平均来看,请估计像你们这样的

企业，一般会将多大比重的年销售额，用于向官员支付非正式酬劳或礼物？”（EBRD，2005）此外，还可参考世界银行2008年对30个转型经济体中企业的调查数据，以企业贿赂占销售额比重来测量企业腐败程度。比如，询问企业“有时被要求给官员送礼或者非正式支付，以便能够在海关、税收、许可证、管制和服务等方面‘把事情做好’。那么企业出于此目的，通常会支付年总销售额或者年总估计价值的百分之多少，作为非正式费用或者礼物给政府官员？”（Krammer，2014）

第二，腐败频率。比如，可以采用1~5分量表的问卷调查，询问EMBA和MBA毕业生：“你所知道的其他企业”和“像你这样的企业”，在以下各种情形中的花费分别“超过2000元人民币”的频率：①分别在重要节日，邀请官员参加公司举办的研讨会或聚会，邀请官员参观公司，邀请官员讲话四种情况下，所提供的酬劳或礼物；②发生与公司有关的政策或社会问题时，分别为政府官员提供的：酬劳或礼物，招待费，差旅费。通过剔除部门经理及以下职位的受访者，即可获得较为真实、准确的企业腐败数据（Gao，2011）。又如，可以询问企业“是否要支付与进出口许可、营业执照、汇率管制、税务、治安或贷款有关的不合理的、额外的费用”，并用1~7分量表表示企业行贿或被索贿的普遍性（Kaufmann & Wei，1999）。1996年和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对几十个国家的企业调查提供了这些数据。

世界银行2009年商业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也采纳同样的调查方法（De Rosa et al.，2010）。

第三，是否腐败。既可直接询问企业是否腐败，亦可根据企业对腐败额度或频率的回应，判断企业是否腐败。2000年和2002年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询问私营企业主“你认为本地区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政策来反腐败”，来获取企业对腐败的主观感受。^① Du等（2008）运用这一数据，探讨了腐败和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关系。

第四，综合方法。覆盖83个国家10032家企业的2000年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询问了企业负责人两个问题：①腐败频率：企业为了办事，多久必须向政府官员支付一次非正规的“额外酬劳”？选项1~6代表频率由强到弱。②腐败额度：像您这样的企业，每年需要将收益中的多大比重支付给公务人员？选项1~7表示由小到大。与此类似，世界银行联合中国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2000~2002年“投资环境调查”（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涵盖了中国18个城市2400家企业。其中，是否贿赂可根据企业汇报的贿赂情况生成，贿赂强度则可由企业汇报的2002年贿赂总数与当年净资产之比计算得出（Huang & Rice，2012）。

2. 间接度量：基于公开资料的代理变量

迄今为止，中国情境下企业腐败的代理测量方法，主要来自上述“投资环境调查”。除2000~2002年第一轮调查外，2001~2003年开

① 该调查自1991年开始，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及其所有者各方面状况。除1991年由国家体改委和国家工商局组织外，随后调查由中央统战部 and 全国工商联主持，迄今共开展了十轮，调查年份分别为1991年、1993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2年。各次调查问卷详情可参考：http://www.usc.cuhk.edu.hk/DCS/DCS31-16.aspx#***。

展的第二轮调查包含了辽宁省 15 个主要城市的 1070 家企业。2005 年实施的第三轮调查囊括了除西藏自治区外的 30 个省区 120 个城市 12400 家企业。这三次调查所获得的截面数据,可被整合为时间跨度为 2000~2005 年、包含 128 个城市 15870 家观测企业的面板数据库。其中,企业的招待和差旅支出费用之和除以企业总收入,可以作为测量企业腐败的指标——这两种费用会被要求公开在会计名目中,且很有可能被用来掩盖企业的腐败支出 (Cai et al., 2011)。更早之前,陈冬华等 (2005) 曾以吃喝和差旅费表征国企高管“超额的、灰色的”职务消费,衡量高管腐败。

也有研究仅仅运用上述 2005 年的截面数据,将企业的招待费和差旅费分开,并将人均招待费用作为腐败的代理指标——差旅费中有部分是合理支出,尤其是营销人员的正常业务支出 (黄玖立和李坤望, 2013)。当然,考虑到企业也可能将行贿的支出或购买礼品的灰色支出合理化包装后进入差旅费,也可合并招待费和差旅费进行稳健性分析,还可使用企业公车、股权集中度作为工具变量来测量腐败程度,以防止内生性问题加剧。此外,还可使用企业与税务、公安、环保和劳动保障等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的时间占全年时间的比重,来测量企业腐败 (Wang & You, 2012)。

三、企业腐败的多层动因

基于既有研究,下面从个体、组织与环境三个层次由内而外逐层深入分析企业腐败的驱动因素,以期反腐败提供制度依据。

(一) 个体层次的动因与机制

企业腐败在组织内部的运作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个体单独行动 (如 CEO 或董事长等个体单独进行贿赂等腐败行为);另一类为个体行为拓展至群体再上升到组织 (如由 CEO 或董事长到高管团队再到企业整体参与贿赂等腐败行为)。无论哪一类,其最终载体仍为个体。因此,对个体层次动因与机制的探究,有助于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本质进行归因。

1. 动因:个体的主动或被动特质

代表组织实施贿赂等腐败行为的个体,影响其行为的个体因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Ashforth et al., 2008): ①主动方面,包括个体缺乏正直 (Frost & Rafilson, 1989)、道德认同 (Reed & Aquino, 2003)、自我控制 (Marcus & Schuler, 2004) 和同理心 (Eisenberg, 2000),以及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水平较低 (Weber & Wasielesik, 2001) 等。②被动方面,根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的普遍限制。比如,无法识别情景中的道德本质 (Butterfield et al., 2000),惯常发生的系统性认知偏差 (Moore et al., 2006),背离道德标准的倾向 (Bandura, 1999),理顺思想意识以重塑行为的方式 (Ashforth & Anand, 2003),以及运用倾向于排除伦理维度的认知脚本 (Gioia, 1992) 等。这些人类能力限制的客观存在,影响着个人的行为,似乎使腐败成为一种必然。

2. 机制:从个体扩展到群体再上升到组织

腐败行为从个体拓展到群体再上升到组织,需要满足三个要件:权力、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和社会化 (socialization)。代表组织实施贿赂等腐败行为的个体,必然掌握着权力,能

够行使决策权。这些掌权者们经过个人或小团体判断，代表组织做出腐败决策后，便伴随着实施者们的合理化与社会化过程。

(1) 从个体到群体。作为一种心理战略，合理化允许员工将腐败行为视为正派做法。员工们可能会集体使用这种战略，来抵消由于参与非伦理行为所产生的悔意或负面情绪。组织中个体使腐败合理化的最常用策略包括六个方面：否认责任（认为自己除了参与腐败别无选择）；否认伤害（认为无人将会因自己的行动受到伤害，因而并非真正的腐败）；否认犯罪（认为受到侵害的当事人都是罪有应得）；社会权衡（认为腐败的谴责者没有资格批评自己，或者认为其他人比自己更坏）；追求更高的忠诚度（认为自己违反律条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价值）；平衡总账（使用工作中积累的努力，合理化自己越轨的权力）（Anand et al., 2005）。可见，合理化的产生，缘于个体预防腐败行动前的内疚和阻力，或缓解腐败行动后对个体行为的担忧（Staw, 1980）。

(2) 从群体到组织。与合理化相伴，腐败过程的持续，需要社会化的支持。社会化策略诱使腐败单位的新进入者们接受并参与正在进行的非伦理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合理化行为。社会化进程告知新人们所需的价值观、信念、准则、技巧等，以助其在组织背景下履行职责并有效发挥作用（Van Maanen, 1976）。它成为组织延续腐败的工具——企业通过吸纳、渐进式和妥协这三种过程（Ashforth & Ananad, 2003），在社会化进程中向新人们灌输意识形态，使其形成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感，并与同事的行为保持一致，继而参与到企业的腐败行

为中。因而，那些墨守成规者，往往比超越常规者更容易犯罪（Cressey, 1986）。

（二）组织层次的动因

1. 静态动因

(1) 企业规模上，规模较小的企业更有可能行贿（Wu, 2009）。这是因为：其一，规模较小的企业缺乏抵制官员索贿的能力，且它们因为规模小，通常不会引起政府纪检部门和执法机构的注意（Svensson, 2003）；其二，大企业通常有健全的内部程序来处理包括贿赂在内的各种商业腐败，但小企业通常没有适当的内部条款来处理此类问题（Arvis & Berenbeim, 2003）。

(2) 经营绩效或预期收益。高速增长的企业更容易行贿（Wu, 2009），近期和未来盈利更多的企业更可能行贿（Clarke & Xu, 2004）。Gao (2010) 也证实了企业预期收益与其贿赂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企业选择去贿赂政府官员的动机在于，其预期收益超过贿赂所承担的成本。

2. 动态动因

(1) 公司治理上，相比股东控制的企业，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更倾向于行贿（Chen et al., 2015）。由于亚洲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计实务也不够理想，导致企业内部的贿赂难以被发现或减少（Wu, 2009）。

(2) 经营战略上，企业的出口导向越大、外资或公有产权的份额越高，则其向政府官员支付的贿赂越少（Lee et al., 2010）。大部分亚洲企业的家族企业形式，使其容易成为腐败官员的索贿对象。腐败官员认为，家族企业是其

理想的交易伙伴，因为他们只需要与一些个体而非大量的企业打交道即可完成交易，这样便减少了贿赂行为曝光的可能性（Wu，2009）。

（三）环境层次的动因

环境动因包括任务情境和制度环境两个方面，两者均通过对组织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做出反应，但压力形式迥异：前者通过影响投入和产出的结构性压力；后者则通过法律、法规、社会文化及专业化的要求对维持组织合法性的成本产生影响。

1. 任务情境

任务情境是企业腐败嵌入的第一个层次，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包容性、复杂性和动态性（Dess & Beard，1984）。Baucus（1994）额外加入不确定性环境，将它们作为企业腐败的共同动因。Luo（2005）将企业腐败的任务情境动因概括为寡头垄断程度、法规控制、结构不确定性三个方面，认为它们分别通过资源依赖（Pfeffer & Salancik，1978）和信息不确定性（Lawrence & Lorsch，1967）与组织产生交互作用。其中，寡头垄断程度与监管控制，反映了企业竞争者与监管方的资源依赖；结构不确定性则表明，行业结构信息的变异性抬高了企业的交易与协调成本。理论预测及实证研究通常认为，放松管制通过降低腐败官员的提取租金能力，能够减少企业的行贿。与此相异，Wu（2009）发现，如果一场有关理想服务的价格战加剧，则更高的市场竞争水平可能增加贿赂水平。Huang 和 Rice（2012）发现，外国竞争者在中国的腐败参与，将会导致中国国内企业支出更大的贿赂。

2. 制度环境

与任务情境类似，制度环境也通过对组织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做出反应，但这两种压力的形式却迥异：任务情境通过影响投入和产出的结构性压力来影响业务运营。制度环境则通过法律、法规、社会文化及专业化的要求对维持组织合法性的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业务运营。作为重要的资源形式，制度环境包括制度的透明度、公平性与复杂性三个维度（Luo，2005）。削弱或诱致企业腐败的制度环境，涵盖了 GDP、经济开放程度、政治体制的质量、法律和文化根源诸方面（Sanyal，2005；Treisman，2000），可以概括为正式与非正式两个方面。

（1）正式制度。目前对影响企业腐败的正式制度的探讨，总体上涉及腐败的法院系统、复杂的许可要求、对法律法规的非透明解释、无效率的政府服务，以及高额的税收（Wu，2009）。

从被动角度看，寻租理论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视为一种重要的腐败来源（Buchanan，1980）。比如，Lee 等（2010）指出，政府官员通过运用条例和管制来行使其剩余控制权，进而迫使企业向其行贿。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越大，索贿的机会就越多（Wu，1999）。又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缺乏提供优质服务的竞争，或促使其提高服务的激励，从而导致他们不可能提供标准化的服务质量。较低的政府服务质量，使得企业不便获取正常的资源和机会。企业要想消除这种不便，获得打包服务（Packaged Service），就必须以行贿为代价（Gaviria，2002；Rose - Ackerman，2002）。相反，对规则更透明的解释，以及更好

的政府服务，将会导致企业更小的行贿倾向（Huang & Rice, 2012）。

从主动角度说，当企业面临管制时，贿赂成为摆脱管制的一种策略（Svensson, 2003）。以政府征税为例，在面临更高税负的企业中，偷税漏税是财务造假的一种普遍形式（Palda, 2001）。偷漏税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贿赂税收官员、实施财务造假的动机，因此，当企业面临着更高的税负时，其更有可能参与贿赂（Wu, 2009）。

事实上，政府管制往往与企业预期收益一起，共同影响企业的腐败水平。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为企业获得潜在收益创造了机会。为了获得这些额外的资源或机会，企业便会行贿（Li & Ouyang, 2007）。也就是说，预期收益部分地调节了政府干预和企业贿赂之间的关系（Gao, 2011）。

（2）非正式制度。腐败的普遍性与任意性。腐败的普遍性反映了企业与当地政府官员接触中遭遇腐败的平均可能性；任意性则指在既定的国家或地区中，与腐败交易相联系的不确定性的固有程度（Rodriguez et al., 2005）。当腐败的特征变成惯例，就构成了组织外部制度环境中的基本成分（Collins & Uhlenbruck, 2004）。腐败越普遍，企业接触到腐败的机会就越多，其向政府官员行贿就越多；腐败越任意，企业接触腐败就越困难，其向政府官员行贿就越少（Lee et al., 2010）。对跨国公司而言，其子公司所在东道国及其母国的腐败水平，均与子公司在当地参与腐败行为的需要正相关（Spencer & Gomez, 2011）。

文化和道德规范。目前，学界对文化影响

腐败的判断存在两种相反结论：一方面，文化的有用性。比如，在美国，产业中的文化竞争是企业腐败的重要成因（Coleman, 1990）。又如，美国与中国香港的经理人对道德行为的判断几乎没有文化相似性，说明文化对道德选择有影响（Ralston et al., 1993），这种影响更明显地反映在跨越国界时道德判断的变化（Robertson et al., 2002）。另一方面，文化对腐败和伦理道德观没有影响。这一结论源自对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经理人的道德信念的检验（Abratt et al., 1992）。之所以得出相反结论，是由于它们在方法、样本选择或分析层次上并不一致；并且，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和男性化，均与腐败的预期程度正相关（Robertson & Watson, 2004）。随着研究的发展，人们开始考虑文化和经济共同作用于腐败的效应。比如，人均收入和腐败的认知观念成反比（Husted, 1990）。又如，经济不景气与腐败正相关，文化则能缓解腐败程度（Getz & Volkema, 2001）。

可见，无论是握有绝对权力的高层个体单独腐败，抑或是其通过权力施压，辅以合理化与社会化策略，最终使高管团队甚至公司整体腐败，均需具备以下条件：①掌权者具有以上个体主动或被动的特质；②个体动因与组织、环境层次的动因形成互动，如政府严格管制资源，企业为了获得发展机会而需向政府官员行贿。

四、企业腐败的多重效应

主流结论认为，企业腐败是掠夺或扶持之手。这与宏观层面腐败氛围影响经济效率的结

论一致(聂辉华, 2014)。也有极少研究将其视为无为之手(Kuncoro, 2006)。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了不同情境下的权变效应。

(一) 掠夺之手

一些研究发现, 腐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种机制从两方面实现: 第一, 行贿增加了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 第二, 腐败增加了风险溢价, 导致财务成本增加(Wu, 2009)。此外, 还有在实施管制的官员身上花费的时间成本(Kaufmann & Wei, 1999)。尽管贿赂会花费企业大量时间与官员打交道, 却并不能帮助企业避免烦琐的管制规定从而获得次优效率(De Rosa, 2010)。还有研究指出, 腐败会导致更弱的产权保护, 从而迫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而避免研发、品牌与营销等无形资产投资, 因而会阻碍企业成长(Claessens & Laeven, 2003)。具体数量上, 据估计, 腐败使亚洲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了5%(Kraar, 1995)。也有研究指出, 作为官员对企业资源的掠夺, 贿赂阻碍了企业增长, 且这种阻碍作用是税收的3倍(Fisman & Svensson, 2007)。

(二) 扶持之手

持“掠夺之手”观点的研究, 多将企业置于被动地位, 忽略了企业主动腐败的情形。为此, 这里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 介绍企业腐败的积极效应, 也即“扶持之手”。

静态绩效。作为转型经济中俘获政府的一种策略, 贿赂有助于企业获得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一些关键服务, 从而促进企业增长(Hellman et al., 2003)。在经济转型国家, 企业贿赂显著正向影响其销售增长的机制, 来源于贿赂的两种功能——“润滑剂”或“保护费”所建立的

“关系资本”(李捷瑜和黄宇丰, 2010)。其中, “润滑剂”意指腐败有助于企业有效率地获取资源或服务(Lui, 1985), “保护费”意为腐败有助于企业免受政府官员的敲诈与掠夺(Acemoglu & Johnson, 2005)。

除静态绩效外, 企业腐败对其营销、创业、创新等动态战略的影响与机制,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 从企业腐败对其产品销售渠道的影响来看: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生产率、所有制等特征后, 招待费支出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对政府或国有企业的销售, 从而证实招待费确实被企业用于获得订单的不正当竞争手段(黄玖立和李坤望, 2013)。又如, 贿赂能够显著减少新建企业的复杂程序以及较高的最低资本要求等政府管制, 从而大大增加企业家的创业活动(Dreher & Gassebner, 2013)。再如, 企业腐败是将创新产品引入市场的一种更有效手段, 且这种效果在普遍腐败的国家更加明显(Krammer, 2014)。并且, 企业腐败对创新具有三类效应: ①挤出效应: 企业仅仅因为政府威胁的“保护费”而实施贿赂, 在企业支出预算既定的前提下, 增加的腐败支出, 必然导致研发支出的减少; ②替代效应: 企业通过腐败支出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 从而不必实施创新战略也能保持在市场的竞争优势, 因而减少了研发支出; ③刺激效应: 企业将通过腐败支出获得的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 用于更多的研发活动, 从而获取长期竞争优势(刘锦和王学军, 2014)。

(三) 权变之手

研究发现, 向政府行贿的费用(娱乐与差旅支出)对企业具有多重功能: 获得更好政府

服务的润滑剂；降低税率与政府过度管制的保护费；建立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资本的正常业务支出。尽管企业腐败在总体显著负向影响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当企业位于政府服务质量较低的城市，或遭受严重的政府干预，又或位于贫穷地区时，这种负向影响的显著程度更弱（Cai et al.，2011）。又如，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区，腐败可能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当金融市场更发达时，腐败则阻碍了企业成长（Wang & You，2012）。

五、企业腐败的控制策略

（一）组织内部的腐败治理

1. 控制腐败的合理化与社会化

组织消除腐败的最直接方法，便是排除并阻止腐败个体的进入（Lanyon & Goodstein，2004）。更系统化的方案，则是通过三条路径控制与腐败相关的合理化和社会化：第一，培养员工们的意识，训练员工们熟悉组织化和社会化的策略，使其对此类行为保持警惕，以提高组织中的道德氛围；第二，运用超越数字的绩效评价——因为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基于数字结果的评价，可能大大增加了由合理化和社会化策略所驱使的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Ashforth & Ananad，2003）；第三，通过高管以身作则，培养组织中的道德氛围（Anand et al.，2005）。

2. 有效的层级化和正式化

层级化和正式化可能阻止内部员工勾结引发的企业腐败（Holmstrom & Milgrom，1991）。层级化有助于信息在企业内部安全有效地流通，从而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监督员工，阻止员工

的内部勾结。同时，既然企业员工之间的长期关系更容易导致员工勾结和腐败，那么老企业应比新企业更需要层级化来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员工的流通率，是缓解长期关系带来勾结和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正式化则通过劳动合同、工作说明书、工作评价方法、政策和程序手册等正式的规章制度，限制使用权力进而减少内部腐败。

此外，企业还可通过限制员工的自主权，减少腐败机会以及其中的潜在利益（Zimmerman，2001）。研究证实，拥有自主权的管理者存在腐败的可能性，但制度化和正式化能够增强权力使用的规范性，有效遏制管理者对权力的滥用（Sundstrom，1988）。

不难发现，组织内部的腐败治理措施，包括正式（如奖励体系和正式的伦理行为）和非正式（如领导行为的变革）两方面，以便组织成员定位并承诺更高标准的行为（Weaver et al.，1999）。但这也意味着，腐败行为已深度嵌入组织内部的道德和认知框架中，影响组织成员的思考和行动。此类研究的不足在于，它们仅聚焦于控制组织的内部腐败，以及社会规范和认知效应对组织内部行为的影响，而忽略了从外部乃至整体视角控制腐败。

（二）组织外部的腐败治理

与前述内部视角不同，有研究强调，解决腐败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于从外部着手，剥夺企业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 power），以及消除对腐败行为的激励（Klitgaard，1988）。具体措施包括培育有效运行的市场规则，构建可问责、透明的政府治理架构，以及使腐败非法化的强制惩罚机制（Tanzi，1998）。

然而,这种方法对于如何构建最佳路径,来整顿既存的腐败体系仍不明晰(Misangyi et al., 2008):一方面,市场自由化被很多人认为是减少腐败的灵丹妙药。它意味着政府的过度、正式管制结构的移除。但是,促使市场自由化的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仅在理论上对消除腐败有效,却导致国家分裂,如苏联的解体。另一方面,不合理地加入管制和惩罚结构,已成为反腐的惯用手段。尽管有证据表明,管制改革可能增进了经济绩效,如增长和投资(Abed & Davoodi, 2000),但鲜有证据显示,这些改革有效降低了腐败。这部分是因为腐败组织通过弄虚作假来应对管制的变革(Tisné & Smilov, 2004)。

因此,要突破组织行为学与经济学视角的局限,需要整合宏观的制度理论和微观的集体认同理论,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腐败问题。因而,致力于反腐的改革者,必须作为“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来行动。具体而言,无论在宏观、微观抑或二者兼有的层次,制度企业家应提出一个新的反腐制度逻辑,同时制止支持既有腐败逻辑的身份、认知模式与组织实践,并确保必要的资源来实施并维持这个新的、众望所归的反腐逻辑(Misangyi et al., 2008)。

(三) 内外部协同的腐败治理

监管方通常认为,组织不会适当地自我管制,因而有必要加强外部手段和制裁。这种外部监管减少了企业的自主权,自然难以受到欢迎。尽管如此,外部管制仍是减少腐败的综合而有效的方法。当然,虽然它是一种有效且必须的方法,但若对其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道德

文化的创造,仍无法有效控制企业腐败。因此,控制企业腐败的最佳方法,便是强调法律和管制责任支持下的愿望和价值观(Ashforth et al., 2008)。

此外,即使组织开始采用设计好的正式制度——包括高管监管、行为准则、沟通和培训体系、匿名举报体系、对不端行为的明确纪律措施——来阻止不道德和不合法行为,但若忽视推动标准形成的内部文化的构建,也会导致这些标准很容易从组织的日常运作中被分离(Weaver et al., 1999)。可见,多样化的制度准则及其下设的正式道德机构,均无法真正解决企业腐败问题。因而,组织可以通过逐渐营造内部文化,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来支撑、固化道德行为,形成引导员工的标准,并影响其行动(Ashforth et al., 2008)。

内外结合的视角清楚地表明,在外部管制、内部自我控制的作用下,企业内部文化的构建对企业腐败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国家、企业三者对于企业腐败的控制而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方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目的——控制企业腐败。

(四) 多维度的腐败控制

根据不同维度划分的企业腐败,应采取相应的反腐败措施。比如,当腐败程度较高且涉入组织层级较多时,应实行结构化的外科手术,以阻止猖獗的腐败行为渗透到整个组织中;当腐败程度较高而涉入层级较少时,应实施专科手术,以治疗集中于特定的业务单元、领域或地区中的严重腐败疾病;当腐败程度较低而涉入层级较多时,可采用渐弱的注射方式,来治疗小规模、处于早期阶段却是整体腐败的疾病;

当腐败程度较低且涉入层级较少时，则需部分药物治疗，以消除寄生于小部分组织中的少量腐败症状（Luo，2005）。

类似地，过程或结果导向（纵向）与社会/文化或管理传导渠道（横向）的八个不同交叉区域，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腐败控制机制：①科层控制：将工作过程标准化，也包括使规则、路线和政策程序化，阶层和集权结构化，工作专门化。②惩罚：建立惩罚腐败行为的相应措施，促使人们从其行为结果中学习。③激励联盟：关注外部激励对行为的影响，但更多致力于确保员工与领导的目标一致性。④法律/法规制裁：管制制度制裁的压力，促使理性的决策者避免实施腐败行为。⑤社会制裁：预期的外部审判，会影响组织中个人的行为。⑥监督控制：关心最终对组织有建设性意义的员工偏离群体规范的方式（Warren，2003）。⑦自我控制：个人自愿受组织中社会/文化的影响。⑧协调控制：与科层控制类似，通过可接受的行为参数，减少自主权的负面作用（Lange，2008）。这种多维度的腐败控制模型，创造性地将控制类型置于其他类型的背景下，为研究腐败控制做出了重要的概念性贡献。

六、中国情境下企业腐败的特殊性

（一）转型期的市场、法制与政府管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成为日益增加的贿赂和腐败的基本驱动因素（Shafer et al.，2007）。换言之，中国变化环境中的转型和配套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创造了日益增加的机会和动机（Guo，2008）。这

种特殊的商业环境，使中国的企业腐败有别于西方情境，并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1.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就市场化改革与企业贿赂倾向的关系，学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方面，开放的竞争提高了透明度，降低了腐败水平（Ades & DiTella，1999）。其内在机制在于，增强的市场竞争通过减少垄断、为企业提供新的销售机会，使得企业支付贿赂的可能性减少，因而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越具竞争性，支付贿赂的可能性就越小（Wu，2009）。另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贿赂的普遍性。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放政策，为本土商业环境中的企业创造了大量机会（Dunfee & Warren，2001），但外国企业的不断进入也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可能都不得不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来获取有限的稀缺资源和机会（Huang & Rice，2012）。进一步，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腐败，腐败的普遍性逐渐提高，使得企业认为参与贿赂等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是巨大的，因此也会加入众多的贿赂者队伍。此外，伴随参与贿赂企业数量的增加，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接触政府并认识到政府可分配的资源 and 机会等潜在利益，从而强化了政府干预和特定企业的预期收益（Gao，2011）。

2. 法律体系不健全

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乃至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地区，由于经济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并不完善，市场并不健全。为控制腐败行为的传播，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潜在的

安全阀门,对腐败官员和支付贿赂的企业双方都造成了风险 (Treisman, 2000)。但是,在许多亚洲国家,法律体系本身也如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导致行贿等企业腐败行为更广泛地蔓延 (Wu, 2009)。

3. 政府管制加强

传统的寻租理论将腐败视为寻租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 (Rose - Ackerman, 1999)。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以执照、配额、许可证、批准、授权书、特许经营权转让等形式,创造了任意性和人为的稀缺性 (Gao, 2011)。为了在政府官员干预下获得更好的机会和资源,企业不得不向相关政府官员行贿。因此,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被视为腐败的主要原因 (Manion, 2004)。在中国情境下,经济转型期间,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明显增强;政府为加速经济增长、推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调整收入分配、控制商品价格和其他经济活动而运用各种工具或政策。这就为寻租行为的双方——官员和企业同时创造了机会。实证分析证实,企业腐败行为与政府干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Gao, 2011)。

(二) 传统的商业文化与独特的道德认知

1. 传统的商业文化——关系

“关系”是社会网络的俗称 (Yeung & Tung, 1996)。它起源于依靠潜在的等级、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道德原则而长期建立的儒家传统 (Hwang, 1987),并通常被认为是在中国社会获得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Ren et al., 2009),甚至意味着一切 (Fox, 1987)。进入中国市场,就意味着进入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Su & Littlefield, 2001)。关系是互惠的,它同时蕴含了请求/接受支持的优势和报答的义务 (Hwang et al., 2009),因而,关系运用对中国商业道德认知和腐败存在两种对立效应:它不仅影响了个人职业/晋升、商业合同/贸易,也会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

具体而言,一方面,关系有利于商业的正常开展。它能帮助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避免坏账,还有助于获得政府的许可和贷款、项目和资源 (Warren et al., 2004)。中国人通常赞成为维持关系网络而使用礼物,且认可对官员的“简化支付”以保证正常经营 (Pederson & Wu, 2006)。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中国内地的经理人信奉儒家价值观,但那些信奉道家道德哲学等相对论的人,更倾向于看到腐败有利的一面 (Tian, 2008)。然而,绝大多数香港银行业经理人所应用的道德理性,则是基于捍卫法律和社会规范而非服从或互惠的原则 (Ho & Redfern, 2010)。

另一方面,关系也会增加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发生。不恰当地运用关系,可能会引发中国社会中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等不道德行为 (Hung, 2008)。研究显示,企业间更高的社会网络水平,与更大的行贿倾向显著相关;单个企业的社会网络水平,与涉入的行贿总额显著正相关 (Huang & Rice, 2012)。也就是说,在中国情境下,关系的运用与商业道德标准、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呈负向关系 (Ang & Leong, 2000)。

承载这一逻辑, Khanna 等 (2015) 研究发现,CEO 通过其委任决策与高管及董事建立起来的关系,会显著提高公司违规倾向,并降低违规后被稽查出的概率。并且,这种关系通过

协助掩盖腐败行为、降低 CEO 被发现后解雇的可能性，以及降低执行非法行为的协调成本，降低了腐败的预期成本。此外，曾经的工作、教育或社会组织经历形成的网络关联，以及基于此形成的关系，对腐败并不重要。类似地，陆瑶和胡江燕（2016）研究发现，CEO 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会显著提高公司违规倾向，并降低违规后被稽查出的概率；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和风险偏好，会显著增强“老乡”关系对公司违规的影响，而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则会显著地减弱“老乡”关系的影响。此外，陆瑶和李茶（2016）研究表明，CEO 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增加时，公司违规的可能性增加。公司所在地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高，CEO 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倾向的影响越弱；而所在地的风险偏好越高，这一影响则越强。最后，本文研究了 CEO 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一个潜在渠道——阻碍和延长稽查时间。上述结论意味着，上市公司管理层、投资者、监察机构和公司治理专家应审慎关注基于委任的 CEO 关系、裙带关系、CEO 对董事会的影响力等软因素对公司腐败的影响。

此外，在讨论关系对腐败程度的影响上，还存在一些新颖的观点。比如，关系可以分为工作关系和后门关系：前者是与职场目标有关的互惠过程，后者则是商谈业务解决方案的过程，且这种解决方案涉及其中至少某一方的个人收益，它与腐败、贿赂、庇护等不道德的行为相联系（Bedford, 2011）。类似地，面临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的关系运作过程又可分为运用关系和滥用关系：前者将行贿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挑战策略，后者将行贿作为一

种消极的防御，且这两种形式关系的运作，都会导致贿赂趋势的增加以及腐败水平的上升；而作为培养关系连接的必要代理，中介机构可能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伦理行为的恶化（Huang & Rice, 2012）。

2. 独特的道德认知

受传统儒家、道家等先哲们对道德认知的影响，中国人对腐败有着独特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运用中，交换礼物是一种常见的、可接受的商业惯例，传统的商业关系因此而得到发展。但这在西方却是无法接受的行为（Hwang et al., 2009），因为交换礼物的行为会导致普遍的官僚腐败，而个别官员试图以其关系的使用来索要“经济租金”（Pederson & Wu, 2006）。第二，中国经理人对中国最普遍的三种商业贿赂形式（贿赂、折扣和送礼）的有利程度的认知，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道家的“相对主义”正相关，即认为贿赂更有利（Tian, 2008）。第三，根据中国的法律，送礼是否属于贿赂行为取决于礼物的价值，若礼物大到足够影响接受者的决策，那么这份礼物就成了贿赂（Tian, 2004）。因此，在中国判断送礼是否为贿赂，存在一条准线，虽然并非十分清晰：在准线以内，送礼纯属中国社会的人情往来；但越过此线，送礼就变成一种违法的贿赂行为。

七、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前瞻

（一）结合供给与需求，比较中国与西方

研究对象方面，国内腐败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共机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

(白景坤, 2009), 却较少关注企业组织; 对企业腐败的少量研究, 又聚焦于高管腐败而非企业腐败 (徐细雄, 2012); 国际研究关注跨国公司, 国内探讨则聚焦于国有企业 (黄群慧, 2006; 徐细雄和谭瑾, 2013)。然而, 如前所述, 绝大多数腐败发生于商业组织与政治机构之间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1)。因此, 未来对腐败的研究, 应首先突破既有对非政府或者企业内部高管腐败的探讨, 增加对利润驱动的商业组织的关注 (Luo, 2005)。更进一步地研究则应结合腐败的供给与需求双方, 构建系统的分析框架。

研究情境方面, 当前有关企业腐败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因而, 借鉴西方情境下较为完善的企业腐败研究成果用以指导中国实践必不可少。然而, 转型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都有别于西方国家, 腐败问题更加独特 (李莉, 2013)。因而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企业腐败研究结论。目前鲜有文献在微观层次探索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腐败程度和形成机制 (寻民利, 2001), 也就未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腐败控制策略。因而, 未来研究可结合转型中国不同地区、行业与所有制企业在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 探索企业腐败行为的特点与成因, 例如就所有制而言,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腐败是否一个偏重于组织腐败, 一个偏重于个人腐败? 两者危害是否存在不同? 治理的视角有何差异? 民营企业普遍努力营造的政企关系有何影响?

(二) 融合学科视角, 整合分析框架

学科视角方面, 虽然海外腐败研究的功能、

制度或文化学派均从不同学科解释腐败问题, 但大多仅涉及一个方面, 且各学科多在分析其他政治、经济问题的过程中附带涉及腐败问题, 或将腐败问题作为其他问题的原因或结果 (李莉, 2013), 因而不夠专门、系统。相比而言, 国内聚焦于公共机构的腐败研究, 大多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而关注商业组织的腐败研究, 则多出于经济学 (刘宏斌, 2006) 或法学 (何增科, 2008) 视角。因此, 未来对企业腐败前因与效应的探索, 应将经济学对个人、组织行为学对组织、社会学对制度的关注有机结合。

理论框架方面, 既有研究集中于考察宏观的地区/行业腐败对微观企业过程与绩效, 或者宏观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 党力等 (2015) 实证证明, 国家整体反腐力度的加强会显著促进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行为。事实上, 对企业腐败前因的探讨, 应该包括环境压力、产业和组织结构以及领导者决策等综合因素 (Misangyi et al., 2008)。因而,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宏观环境因素通过战略领导作用于微观企业腐败的效应与机制。以图 2 中的制度环境为例, 未来可以从两方面探索: ①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对企业腐败的影响 (Keig et al., 2015); ②结合高阶梯队理论 (Hambrick & Mason, 1984), 考察战略领导的作用, 如管理者工作需求 (executive job demands) 或管理自主权 (managerial discretion) 的中介或调节作用 (Hambrick, 2007)。

在此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完善“宏观—微

观—宏观”的分析框架（张三保和张志学，2014）^①，未来还应从微观到宏观，探索企业腐败这种微观现象影响宏观制度变迁的路径。图2也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路径：①经过合理化、社会化的过程，组织层次的腐败累积成为行业、

地区层次的腐败氛围，进而形成腐败的外部环境。②企业腐败通过影响组织的过程与绩效，进而影响行业、地区经济增长，并倒逼外部环境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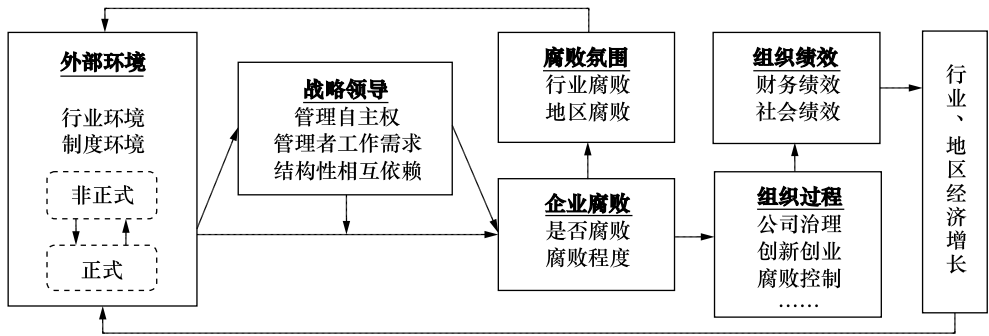


图2 腐败研究的“宏观—微观—宏观”分析框架

（三）更新研究方法，探索测量方案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腐败现象（何增科，2008），或者从理论上推演腐败成因，缺乏基于严谨实证分析的证据（李莉，2013）。比如，从心理社会微观视角出发，探讨从管理者非伦理行为到集体不道德，最后导致企业腐败的衍变过程及内在机制（谭亚莉等，2011）。因此，未来应加大实证研究力度，在继续强调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企业腐败机理的基础上，注重完善企业腐败的测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定量分析。

指标测量方面，中国情境下的企业腐败研究，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其测量方法的开发，以便客观反映现状。可能的数据包括问卷调查和

代理指标两种来源。问卷调查可以参考获取微观腐败数据的访谈方法（Reinikka & Svensson，2006），以及结合自评和他评的测量方法（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代理指标又有两种测量方法和数据来源：①除前述提及的2003年和2005年“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世界银行于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对中国25个城市2848家企业进行了新一轮的营商环境调查。这些企业来自11个制造行业和7个服务行业，共有2700家民营企业和148家国有企业。该调查同样涉及企业的招待费、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等信息，为代理测量企业腐败提供了可能。②可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中，提取诸如被证券监管机构公开谴责或差旅费支出等企业丑闻或腐败的相

① “宏观—微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的提出，受益于姜国华、饶品贵两位学者在第二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

关指标。

(四) 整合多层成因, 探讨形成机制

对中国情境下企业腐败成因的既有探讨, 大多来自组织内部或外部的某一方面。外部方面包括地区市场化进程、贫富差距、财政赤字和失业率等(陈信元等, 2009), 以及经济转轨时期面临的放权改革、政府干预、薪酬管制(徐细雄和谭瑾, 2013)。内部方面则包括组织老化和利益固化在内的组织惰性(白景坤, 2009)。此外, 还有内外兼具: 内生因素包括信息不对称、团队卸责和分权悖论; 外部社会条件则包含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缺陷、委托代理理论揭示的监督机制失灵、社会转型期规则变迁的特殊性等(刘宏斌, 2006)。当然, 内外界限有时也比较模糊。比如, 作为一种替代市场的非正式交换机制, “关系”是腐败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 是腐败制造了“关系”文化, 而非“关系”文化诱发了腐败(Li, 2011)。

除个体、组织与行业层次外, 既有研究对腐败前因的探讨已经扩展到制度层次, 并涉及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其中, 前者包括腐败的法院系统、复杂的许可要求、对法律法规的不透明解释、无效率的政府服务、高额的税收、政府干预水平; 后者则包括关系和社会网络。然而, 这些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指标的开发还不够丰富, 测量精度也有待商榷, 难以准确反映中国转型情境下的真实制度背景。因而, 未来研究应首先系统回顾有关制度环境的理论与相关文献, 挖掘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中特有现象所反映的制度要素, 并检视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的制度变迁。之后, 可结合图 2 中的分析框架, 归纳既有研究中涉及的高管、企

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腐败的制度诱因, 以及影响管理自主权的制度因素, 由二者交集即可确定制度要素。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结合个体、组织、行业、制度等跨层次前因及其互动, 来揭示企业腐败的多层成因, 并比较这些不同层次前因的重要程度, 从而为腐败控制提供依据。

(五) 澄清静态效应, 关注动态过程

企业腐败的静态效应, 涵盖掠夺之手、扶持之手和无为之手三种结论。造成不同结论的根源, 在于组织所处的不同情境。据此, 未来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澄清企业腐败对自身绩效的效应: 其一, 继续发掘不同的情境变量, 探索它们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其二, 考虑两者之间可能不仅是线性关系, 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可能性。企业腐败的复杂性, 一方面出于其繁复的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则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状态, 更是一种过程(Ashforth et al., 2008)。因此, 未来研究应从动态的观点出发, 在上述框架的基础上, 结合战略领导, 探讨企业腐败对更多企业战略与治理的影响。

(六) 探索控制机制, 指导反腐实践

解决腐败问题, “从根本上说, 还得靠改革、靠制度”(李雪勤, 2014)。为此, 应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深化行政组织改革, 精简和整合组织机构, 优化业务流程以及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 来建设克服行政组织惰性、避免腐败行为的机制(白景坤, 2009)。

当然, 解决腐败问题单从宏观制度改革着手还不够, 还应“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李雪勤, 2014)。比如, 应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两方面着手克服企业腐败(刘宏斌, 2006)。对于遏制商业贿赂, 则可落实以下

七条措施：积极推进法律改革；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对公、私部门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完善企业、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完善公职人员行为约束机制；通过专门立法和专业化的执法机构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商业欺诈、贿赂犯罪；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商业贿赂提供有效渠道和保障（何增科，2008）。未来改革措施的研究应紧紧围绕前述总结的企业腐败前因，一方面加强企业内部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完善国家的顶层制度设计，在借鉴多维度腐败控制的基础上，分阶段、有重点、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的整体反腐败工作，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关系。

（接受编辑：贾良定

收稿日期：2016 年 10 月 8 日

接受日期：2016 年 11 月 16 日）

参考文献

- [1] 白景坤：《腐败与组织惰性：探析腐败产生的新视角》，《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8 期。
- [2] 曹德旺：《中国官员的散漫和腐败很多时候是企业家慢慢培养出来的》，http://finance.ifeng.com/business/pic/detail_2014_07/24/37500725_0.shtml。
- [3] 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
- [4] 陈信元、陈冬华、万华林、梁上坤：《地区差异、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管理世界》，2009 年第 11 期。
- [5] 党力、杨瑞龙、杨继东：《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15 年第 7 期。
- [6] 何增科：《依靠制度建设遏制商业贿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 年第 1 期。
- [7] 黄玖立、李坤望：《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经济研究》，2013 年第 6 期。
- [8] 黄群慧：《管理腐败新特征与国有企业改革新阶段》，《中国工业经济》，2006 年第 11 期。
- [9] 李捷瑜、黄宇丰：《转型经济中的贿赂与企业增长》，《经济学（季刊）》，2010 年第 4 期。
- [10] 李莉：《海外中国腐败研究文献述评》，载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 [11] 李雪勤：《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求是》，2014 年第 4 期。
- [12] 刘宏斌：《组织腐败的经济学诠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 [13] 刘锦、王学军：《寻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 30 省 12367 家企业的证据》，《科学学研究》，2014 年第 10 期。
- [14] 陆瑶、胡江燕：《CEO 与董事间“老乡”关系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6 年第 2 期。
- [15] 陆瑶、李茶：《CEO 对董事会的影响力与上市公司违规犯罪》，《金融研究》，2016 年第 1 期。
- [16] 聂辉华：《腐败对效率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金融评论》，2014 年第 1 期。
- [17] 谭亚莉、廖建桥、李骥：《管理者非伦理行为到组织腐败的衍变过程、机制与干预：基于心理社会微观视角的分析》，《管理世界》，2011 年第 12 期。
- [18] 徐细雄、谭瑾：《制度环境、放权改革与国企高管腐败》，《经济体制改革》，2013 年第 2 期。
- [19] 徐细雄：《企业高管腐败研究前沿探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 年第 4 期。
- [20] 寻民利：《从组织意义上认识腐败——兼析腐败的微观机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 年第

4 期。

[21] 张三保、张志学：《区域制度差异，CEO 管理自主权与企业风险承担——中国 30 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管理世界》，2012 年第 4 期。

[22] 张三保、张志学：《管理自主权：融会中国与西方、连接宏观与微观》，《管理世界》，2014 年第 3 期。

[23] 中纪委研究室：《体制障碍是反腐最大障碍》，《京华时报》，2014 年 2 月 3 日。

[24] Abed, G. T. , & Davoodi, H. R. 2000. Corruption, structural reforms, &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IMF Working Paper*, No. 00/132.

[25] Abratt, R. , Nel, D. , & Higgs, N. S. 1992. An examination of the ethical beliefs of managers using selected scenarios in a cross - cultur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 (1) , 29 - 35.

[26] Acemoglu, D. , & Johnson, S. 2005.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5) , 949 - 995.

[27] Ades, A. , & Di Tella, R. 1999. Rents, competition, & corru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4) , 982 - 993.

[28] Anand, V. , Ashforth, B. E. , & Joshi, M. 2005. Business as usual: The acceptance & perpetuation of corruption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 (4) , 9 - 23.

[29] Ang, S. H. , & Leong, S. M. 2000. Out of the mouths of babes: Business ethics & youths in Asi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8 (2) , 129 - 144.

[30] Arvis, J. F. , & Berenbeim, R. E. 2003, *Fighting corruption in east Asia: Solutions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31] Ashforth, B. E. , & Anand, V. 2003. The normalization of corruption i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5, 1 - 52.

zational Behavior, 25, 1 - 52.

[32] Ashforth, B. E. , Gioia, D. A. , Robinson S. L. , & Treviño, L. K. 2008.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topic forum: Reviewing 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 (3) , 670 - 684.

[33]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 (3) , 193 - 209.

[34] Baucus, M. S. 1994. Pressure, opportunity & predisposition: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organization illegal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 699 - 721.

[35] Bedford, O. 2011. Guanxi - building in the workplace: A dynamic process model of working & backdoor guanxi.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4 (1) , 149 - 158.

[36] Buchanan, J. M. 1980, Rent seeking & profit seeking. In Buchanan, J. M. , Tollison, R. D. , & G. Tullock (Eds.) ,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 - seeking society* (pp. 3 - 15) . College Station, TX: A&M University Press.

[37] Butterfield, K. D. , Treviño, L. K. , & Weaver, G. R. 2000. Moral awareness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Influences of issue - related & social context factors. *Human Relations*, 53 (7) , 981 - 1018.

[38] Cai, H. , Fang, H. , & Xu, L. C. 2011.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ment &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54, 55 - 78.

[39] Chen, C. W. , Cullen, J. B. , & Parboteeah, K. P. forthcoming. 2015. Are manager - controlled firms more likely to bribe than shareholder - controlled firms: A cross - cultural analysis.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al Review*.

[40] Claessens, S. , & Laeven, L. 2003.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perty rights, &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e*, 58 (6) , 2401 - 2436.

- [41] Clarke, G. , & Xu, L. C. 2004. Privatization, competition, & corruption: How characteristics of bribe takers & payers affect bribe payments to util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9 - 10), 2067 - 2097.
- [42]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 [43] Collins, J. , & Uhlenbruck, K. 2004. How firms respond to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sights from India. *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 A1 - A6.
- [44] Cressey, D. R. 1986. Why managers commit fraud.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4), 195 - 209.
- [45] De Rosa, D. , Gooroochurn, N. , & Görg, H. 2010. Corruption & productivity firm - level evidence from the BEEPS surve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348.
- [46] Dess, G. G. , & Beard, D. W. 1984.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task environme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9, 52 - 73.
- [47] Dreher, A. , & Gassebner, M. 2013. Greasing the wheels?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s & corruption on firm entry. *Public Choice*, 155, 413 - 432.
- [48] Du, J. , Lu, Y. , & Tao, Z. 2008. Economic institutions & FDI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US manufacturing firm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6 (3), 412 - 429.
- [49] Dunfee, T. W. , & Warren, D. E. 2001. Is guanxi ethical? A normative analysi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2 (3), 191 - 204.
- [50] EBR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2005, *Business environment &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 (BEEPS)*. New York: World Bank.
- [51] Eisenberg, N. 2000. Emotion, regulation, &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1), 665 - 697.
- [52] Fein, E. , & Weibler, J. 2014. Review & shortcomings of literature on corruption in organizations in offering a multi - faceted & integr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Behavioral Development Bulletin*, 19 (3), 67 - 77.
- [53] Fisman, R. , & Svensson, J. 2007. Are corruption &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conomics*, 83 (1), 63 - 75.
- [54] Fox, M. , 1987. Marketing/advertising research: In China, guanxi is everything. *Advertising Age*, 58 (47), 12 - 14.
- [55] Frost, A. G. , & Rafilson, F. M. 1989. Overt integrity tests versus personality - based measures of delinquenc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Business & Psychology*, 3 (3), 269 - 277.
- [56] Gao, Y. , 2010. Mimetic isomorphism, market competition, perceived benefit & bribery of firms in transitional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 (2), 203 - 222.
- [57] Gao, Y. 2011.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erceived benefit & bribery of firms in transitional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4 (2), 175 - 184.
- [58] Gavrira, A. 2002.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 crime on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3 (3), 245 - 268.
- [59] Getz, K. A. , & Volkema, R. J. 2001. Culture, perceived corruption, & economics. *Business & Society*, 40 (1), 7 - 30.
- [60] Getz, K. A. 2006. The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prohibition regimes corruption & the antibribery convention. *Business & Society*, 45 (3), 254 - 281.
- [61] Gioia, D. A. 1992. Pinto fires & personal ethics: A script analysis of misse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 (5-6), 379-389.

[62]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63] Guo, Y. 2008.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China Quarterly*, 194, 349-364.

[64] Hambrick, D. C., & Mason, P. A. 1984.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9 (2), 193-206.

[65] Hambrick, D. C. 2007.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 updat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 (2), 334-343.

[66] Hellman, J., Jones, G., & Kaufmann, D. 2003.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corruption, &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4), 751-774.

[67] Ho, C., & Redfern, K. A. 2010. Consideration of the role of guanxi in the ethical judgments of Chinese manage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6 (2), 207-221.

[68] Holmstrom, B., & Milgrom, P. 1991.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 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 job desig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s*, 7 (Special Issue), 24-52.

[69] Huang, F., & Rice, J. 2012. Firm networking & bribery in China: Assessing some potential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firm open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7 (4), 533-545.

[70] Hung, H. 2008. Normalized collective corrup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Small treasuries in large Chines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9 (1-2), 69-83.

[71] Husted, B. 1990. Wealth, culture, & corru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0 (2), 339-360.

[72] Hwang, D. B., Golemon, P. L., Chen, Y., Wang, T. S., & Hung, W. S. 2009. Guanxi & business

ethics in Confucian society today: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in Taiwa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9 (2), 235-250.

[73] Hwang, K. K. 1987. Face &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4), 944-974.

[74] Kaufmann, D., & Wei, S. J. 1999. Does 'grease money' speed up the wheels of commer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7093.

[75] Keig, D. L., Brouthers, L. E., & Marshall, V. B. 2015. Formal & informal corruption environments &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2, 89-116.

[76] Khanna, V., Kim, E. H., & Lu, Y. 2015. CEO connectedness & corporate fraud. *Journal of Finance*, 70 (3), 1203-1252.

[77] Klitgaard, R. E. 1988, *Controlling corrup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8] Kraar, L. 1995. How corrupt is Asia? *Fortune*, 132 (4), 18.

[79] Krammer, M. S. 2014. Greasing the wheels of change: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 institutions on firm innov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14 (1), 10954.

[80] Kuncoro, A. 2006. Corruption & business uncertainty in Indonesia.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3 (1), 11-30.

[81] Lange, D. 2008.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contro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 (3), 710-729.

[82] Lanyon, R. I., & Goddstein, L. D. 2004. Validity & reliability of a pre-employment screening text: The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index. *Journal of Business & Psychology*, 18 (4), 533-553.

[83] Lawrence, P., & Lorsch, J. 1967. Differentia-

tion & integration in complex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2, 1 – 30.

[84] Lee, S. H. , Oh, K. , & Eden, L. 2010. Why do firms bribe? Insights from residual control theory into firms' exposure & vulnerability to corruptio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50 (6), 775 – 796.

[85] Li, L. 2011. Performing bribery in China: Guanxi – practice, corruption with a human f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 1 – 20.

[86] Li, S. , & Ouyang, M. 2007. A dynamic model to explain the bribery behavior of fi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24 (3), 605 – 618.

[87] Lui, F. T. 1985. An equilibrium queuing model of brib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4), 760 – 781.

[88] Luo, Y. 2000. *Guanxi & busines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89] Luo, Y. 2005.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f corruption.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 1 (1), 119 – 154.

[90] Manion, M. 2004, *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1] Marcus, B. , & Schuler, H. 2004. Antecedents of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at work: A gene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9, 647 – 660.

[92] Misangyi, V. F. , Weaver G. R. , & Elms, H. 2008. Ending corruption: The interplay among institutional logics, resources, &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 (3), 750 – 770.

[93] Moore, D. A. , Tetlock, P. E. , Tanlu, L. , & Bazerman, M. H. 2006. Conflicts of interest & the case of auditor independence: Moral seduction & strategic issue cycl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1), 10 – 29.

[94] Palda, K. F. 2001, *Tax evasion & firm survival*

in competitive markets.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95] Pederson, M. , & Wu, V. 2006. Business integrity in China.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33 (1), 32 – 37.

[96] Pfeffer, J. , & Salancik, G. R.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97] Pinto, J. , Leana, C. R. , & Pil, F. K. 2008. Corrupt organizations or organizations of corrupt individuals? Two types of organization – level corrup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 (3), 685 – 709.

[98] Porac, J. F. , & Rosa, J. A. 1996. Rivalry, industry models, & the cognitive embeddedness of the comparable firm.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13, 363 – 388.

[99] Porac, J. F. , Wade, J. B. , & Pollack, T. G. 1999. Industry categories & the politics of comparable firm in CEO compens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4, 112 – 144.

[100] Ralston, D. A. , Gustafson, D. J. , Cheung, F. M. , & Terpstrs, R. H. 1993. Differences in managerial values: A study of U.S. , HONG KONG & PRC manag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4 (2), 249 – 286.

[101] Reed, A. H. , & Aquino, K. F. 2003. Moral identity & the exp and ing circle of moral regard toward out –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4, 1270 – 1286.

[102] Reinikka, R. , & Svensson, J. 2001. Confronting competition: Investment, profit, & risk. In Reinikka, R. , & P. Collier (Eds.), *Uganda's recovery: The role of farms, firms, & government*. World Bank Regional & Sector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103] Reinikka, R. , & Svensson, J. 2006. Using micro – surveys to measure & explain corruption. *World Development*, 34 (2), 359 – 370.

- [104] Ren, B. , Au, K. Y. , & Birtch, T. A. 2009. China's business network structure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 (2), 219 – 240.
- [105] Robertson, C. , & Watson, A. 2004. Corruption & change: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 (4), 385 – 396.
- [106] Robertson, C. , Crittenden, W. , Brady, M. , & Hoffman, J. 2002. Situational ethics across borders: A multicultural examin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8 (4), 327 – 338.
- [107] Rodriguez, P. , Uhlenbruck, K. , & Eden, L. 2005. Government corruption & the entry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0 (2), 383 – 396.
- [108] Rose – Ackerman, S. 1999, *Corruption & government: Causes, consequences, &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9] Rose – Ackerman, S. 2002. Gr & corruption & the ethics of global busines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6 (9), 1889 – 1918.
- [110] Sanyal, R. 2005. Determinants of briber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cultural & economic facto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59 (1 – 2), 139 – 145.
- [111] Shafer, W. E. , Fukukawa, K. , & Lee, G. M. 2007. Values &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ethics &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U. S. versus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0 (3), 265 – 284.
- [112] Spencer, J. , & Gomez, C. B. 2011. MNEs & corruption: The impact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 subsidiary strateg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2, 280 – 300.
- [113] Staw, B. M. 1980. Rationality & justific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ife. In Staw, B. M. , & L. L. Cummings (Eds.) .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45 – 80.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14] Su, C. , & Littlefield, J. E. 2001. Entering guanxi: A business ethical dilemma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3 (3), 199 – 210.
- [115] Sundstrom, W. A. 1988. Organizational failures & wage determination: A historical case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s*, 10, 201 – 224.
- [116] Svensson, J. 2003. Who must pay bribes & how much? Evidence from a cross – section of fir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1), 207 – 230.
- [117] Tanzi, V. 1998. Corruption around the world: Causes, consequences, scope, & cures. *IMF Staff Papers*, 45 (4), 559 – 594.
- [118] Tian, Q. 2004, *A transcultural study of ethical perceptions & judgments between Chinese & German businessmen*. Germany: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 [119] Tian, Q. 2008. Perception of business bribery in China: The impact of moral philosophy sour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0 (3), 437 – 445.
- [120] Tisné, M. , & Smilov, D. 2004, *From the ground up: Assessing the record of anticorruption assistance in southeastern Europe*. Budapest: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the Soros Foundation Network.
- [121] Treisman, D. 2000.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 – 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 (3), 399 – 457.
- [12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1. *Fighting global corruption: Business risk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 :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10731.
- [123] Van, M. J. 1976. Breaking in: Socialization to work. In Dubin, R. (Ed.), *Handbook of work, organization, & society* (pp. 66 – 130) . Chicago: R& McNall.
- [124] Wang, Y. & You, J. 2012. Corruption &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s Review*, 23, 415 – 433.

[125] Warren, D. E. 2003. Constructive & destructive deviance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 (4), 622 – 632.

[126] Warren, D. E. , Dunfee, T. W. , & Li, N. 2004. Social exchange in China: The double edged sword of guanxi.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55 (4), 353 – 370.

[127] Weaver, G. R. , Treviño, L. K. , & Cochran, P. L. 1999. Integrated & decouple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ommitments, external pressures & corporate ethics pract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2 (5), 539 – 552.

[128] Weber, J. , & Waseleski, D. 2001. Investigating influences on managers' moral reasoning: The impact of context & personal & organizational factors. *Business & Society*, 40 (1), 79 – 110.

[129] Wheeler, S. , & Rothman, M. L. 1982. The organization as weapon in white – collar crime. *Michigan Law Review*, 80, 1403 – 1426.

[130] Wu, X. 2009. Determinants of bribery in Asian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7 (1), 75 – 88.

[131] Yeung, I. , & Tung, R. 1996. Achieving business success in confucian societies: The importance of guanxi (connections) .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5 (2), 54 – 65.

[132] Zimmerman, B. J. 2001. Theories of self – regulated learning & academic achievement: An overview & analysis. In Zimmerman B. J. , & D. H. Schunk (Eds.), *Self – regulated learning &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2nd ed. , 1 – 38) .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